



明清时代 庶民文化 生活

王尔敏 著
岳麓书社

海外名家名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王尔敏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海外名家名作丛书)

ISBN 7-80665-186-1

I. 明... II. 王...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风俗习惯—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248.03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068 号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封面设计 章小林

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

王尔敏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45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7-80665-186-1
G·274 定价: 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砚瓦池正街 47 号 邮编: 410073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作者简介

王尔敏字问之，河南省周口市人，1927年生，台湾师范大学毕业。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专长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明清社会文化史，近代基督教史，以及史学方法，皆有论著作资参证。

出版说明

岳麓版《海外名家名作》丛书,专收海外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王尔敏先生近十余年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与著述,《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即是他近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承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推介,纳入“名作丛书”,甚为恰当。

民间世俗文化研究,因资料之难于收罗抉剔,极少有人涉猎深入。王先生以不断追求学术新境之进取精神,潜心砧研庶民文化生活细节,著为专书,堪称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诚如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所言:该书“对两岸三地(包括香港)的学术交流,深具意义”。

本书在台湾两次印行。此次出版,系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年版排印。因作者身居海外多年,原书中有些观点或措辞有明显不符合大陆出版物有关规定要求或读者阅读习惯之处,编辑加工时已作必要的处理。但书中仍有部分内容,如第七章关于命理术数等的描述,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为保存原书学术风貌,未作大的删节修改,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岳麓书社

2002年8月

大陆版自序

鄙人生平研治历史学，因师承关系，得业师郭廷以先生启牖，而多致力于明清史与近代史。从一生刊布论著资证，尚无愧于立足史学家之林。我自然有多方面之开拓探索，在史学建立真知灼见，俾供好学深思者鉴评指教以至参酌引用。所呈献功力，皆个人心血所积，以谨慎勤勉治学。凡为立说论断，俱可凭史料勘验，与先贤对比。一生治学毫无偷苟。博得同道肯定，自亦从多年努力所获致，敢于告慰业师郭廷以先生辛苦培训之恩。附骥于同门学长之末，尚具自信。

以论个人生平学问内涵，查考拙著作目录，可以了然实际。其中以中国近代史占全面主要重点，明清史亦具一定分量，外展至于史学方法、方志学以至与近代息息相关之古代论题，皆有论著可资参证。是即个人治学之成绩所在。相信学界高明之家，定能超然衡断。

我自 1977 年受聘赴香港中文大学史学系任教。于当地环境接触不少，民间残存文献，因而引起保存与认识之兴趣，将精神投注于庶民文化生活之探索研析。其资源多不出于中外大图书馆，实如敝纸粪土一般，快速流失于陋宇坊肆之间，极待检拾收存。遂自以采辑相类之残破故纸，会合大陆学界刊布之资料书，遂亦撰著若干文章，近年并亦草成专书。因命之曰“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不敢以学术著作自况，但愿为我国小民生活存一分实录。甚盼学界高明之家，怜而教正。

我自 1989 年又回台北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同时兼于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国立政治大学讲授专课，因而前后有十位门人随我研究明清时代民间社会文化论题，已各具一类专业学养，自信吾道不孤，尤深信此门学问可以广为开拓，弥望有识之士，共襄盛举。

我表白吾道不孤，非止在于个人与门弟子之传授，而亦前有先驱。若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与我多年相交换研究成果，我是以后生之晚学者自待。而我国通俗文学先驱之郑振铎、锺敬文虽未能接晤，然亦早熟读其著作。同辈中之长者，在台北学术圈中有戴玄之、翁同文、陆宝千等先生，俱各据学术重点特色，得以参酌比较，多所观览。期使共维此一类社会文化史之研究风气，个人亦可在参照比较之下，能悟见新路。

我自1977年到香港任教，由地缘之便，得以与大陆学界同道多所接触，自此相识王戍笙、李侃、陈胜彝、胡守为、刘德麟、陈东林、锺少华、黄鸿钊诸位先生，最早承李侃先生推毂，将拙著《淮军志》在北京中华书局印出，于今已近二十年。甚愿与学界同道获致观摩之实效。1989年返回台北，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两岸学术交流亦日渐开展，前后相识大陆学者更多，相知来往者有耿云志、张海鹏、韦庆远、林庆元、王庆成、金观涛、欧阳哲生、忻平、张海林、江沛、熊月之、易蕙莉、夏东元、戚其璋、孔祥吉、文庸、顾卫民、贺照田诸位先生。承贺照田先生厚爱，将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北京出版。自更显具学术交流之益。我个人至感大陆上学人之崇重学术，以开扩胸怀接纳我的种种拙见观点与治学心得，遂至给予我很大鼓舞，甚愿将论著交托国内学界出版，以求同道学者品评鉴赏。

所当私幸者，今岁六月间，北京大学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来函相告，承其推毂，已将拙著两种分别交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及岳麓书社分别刊布，当时六月签约者为岳麓书社所印之《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在七月签约者，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所印之《近代社会

文化生态及其变迁》。今得岳麓书社编辑曾德明先生来函,相约我为拙著写一篇自序,藉使阅读者略知鄙人治学概况。吾固愿以文会友,多获时贤教益,而能不揣固陋,以与国内同道广结善缘,则更是衷心所祝望。

2001年8月6日写于
多伦多之柳谷草堂

台湾版自序

我从事著作中国社会文化史，是近十馀年间之事。然而酝酿启念，可以追溯一些因缘线索。1955年当我初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首先有七年时间是编纂总理衙门清档和《筹办夷务始末引得》。在此期间，除前述“引得”外，又出版档案史料四种，即《海防档》、《中法越南交涉档》及两种《教务档》。而在编辑之外，本身又加强清季兵工业研究。并又广涉思想史及其他历史门类。特别对于古代神话，颇受院中凌纯声、杨希枚、文崇一、管东贵各位先生吸引，此类书籍，靡有不加旁涉。此时清楚明白，我并未注意社会文化史。

同时在近代史所几位同事先后完成各人专刊之时，偶有一个开会机缘，见到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教授。是在教育部一次半天的联谊会中，酒井是日本学者代表团长，屈万里先生是中方代表团长。近代史所尚有黄福庆兄任日文翻译。就在此一面之下，得悉酒井先生广为搜集中国民间种种浅俗小册，包括经训、宝卷、格言、说唱、木鱼书、子弟书。甚至长红、招帖、没首帖子，无不广为搜罗，成为东瀛独具盛名之通俗文化史大家。自是开始知道原来我们以为破烂纸头，可以在东瀛变成宝贵资料，这也是一门大学问。自此收敛轻视之心，渐渐留心此类文献。实在说来，开窍了解是一回事，想来和个人研究无甚关涉，亦无暇采取行动，作进一步之搜集流览，正是实情。

使我真正用心搜求庶民间鄙俚资料，实还在我研究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后。二者虽相关，实在分属两个不同重心之领域。民初以来研治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名家，均把重心放在民族革

命宗旨上探讨。1949年后,大陆一直在发掘刊印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资料,此时已舍弃民族革命宗旨,但又套上农民起义宗旨,学者把一切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之种种活动,全看成是反抗地主官僚剥削而兴起,乃造成数十年来一种制式理论。嗣后我自1977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后,一连有三篇论文,讨论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我正是推翻以往的民族革命说与农民起义说,而提出生态环境与社会功能说,以就教于学术界。此三篇论文相继问世,俱已达十年以上,学界同仁可以作一比较研考,察看是否经得起考验。

我自1977年到香港任教,有两个机缘,使我决计作民间通俗文化研究。其一得自于刘广京先生的提示,其一是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教授在香港搜集民间文化的热忱。他二人远在海外,都不放过尽心于中国民间世俗文化的细密考察,而我处在近便之地,何可毫无所知?因是而在香港期间,正式严肃思考这个问题。我所搜集的资料,至今还多排不上用场。不过到本书完成为止,我已发表相关论文九篇,并写出本书。

中国民间世俗文化,以明清以来资料最丰富,问题最繁伙,最值得投入心智,探索研析。所幸近年大陆更大量刊印旧日书刊与难得珍籍,可使我取材更广。只是有些当世时人之口述记录,虽然样样俱全,而终不如使用明清原来质材较为放心。是以虽多而只当作参考而不加引据。大陆学者代我搜集资料者有陈东林、王戎笙、李景光、张宪文诸位先生。日本学者又有斯波义信、田仲一成两位教授。其中特以陈东林先生,十多年来代购之书不下百种,真是深深感谢。

民间文化是庶民生活上最直接创造的产物,自不同于官绅生活种种文化内涵。官家包括皇室,自有制度体制,阶级层层,划分有一定界限。并非官民不能相通,但凡功令所定,民人多不能逾越。是以本书讨论,俱以庶民生活领域为主,官家相同之事,则一

概不论。全书分列八个重点,视为明清庶民文化之充分内涵。除此八项重点,学者或问何以不谈衣饰、屋宇及行旅。是固不可缺少。然庶民在官方体制局限下,在此方面俱极粗糙贫薄,难有享用实益。已在本书绪言中申叙。

本书最后分别附列征引书目与参考书目,并非标新立异。只因通俗性之文献,不似国家档卷,经典著述,各家文集,名人笔记之来历清楚,立言有据。庶民文献,往往散乱而无统绪,错综纷杂,舐距重复,片鳞半爪,名实含混。直接引用,亦须剪裁拼凑。雷同者多,更须严加筛选。若不更列参考书目,必使识者启疑,视为有重大遗漏,更费申解。今故同时并列,以免误会。

我自1955年进入中央研究院研究,实受诸多师友启牖。一切学问增长,多自外得益而来。重要领我入门者自是业师郭廷以量宇先生。所研究兵工业及湘淮军,俱出于量宇师之属命。另有张贵永致远先生及陶振誉先生,均系亲承指授之业师。在此时期同时领我开拓眼界者有杨联升先生和刘广京先生,杨先生自命为今世之杂家,启我扩大视野之路,重视全面历史之通识。刘先生以近代史同道,有多次专题之属命。他多年提示我撰写李鸿章,又属命我写近代思想史专书,又属命我研究儒生官僚体制,又属命我深究近代商业,又属命我注意民间文化,又属命我研究基督教史,可说驱使我试探各个领域,对我的治学影响最大。同事中诤友吕实强、邓汝言、李作华、谢文孙、贺凌虚、吕士朋、王树槐、张玉法、李国祁、李恩涵、陆宝千、王玺、李念萱、金承艺、张朋园、陈三井、林明德、黄福庆、陈存恭等,同在近史所切磋最多,天天互相观摩,出以高尚之文明竞胜。相形之下,我自觉最是愚笨,学养不足,极待努力追上这些朋友。因此自署书舍为“九愚一智之书斋”以为写实。代表我自1955年至1977年一段勤修苦练时期。接著我到香港教书,才改题我的斋舍叫做“海山韬影之庐”,仍是以市隐为志,不外继续读

书而已。

四十年来从事研究,大致可谓慎守学者本分,平庸恬淡,毫无旁务。惟因时患严重眼疾,莫不与我阅读细字有关。曾患视网膜剥离及玻璃体出血重病,三年前又遭车祸,使左目眼球撞碎,招致左目失明。使我至今尚能勉力写作者,先后得张荣茂、蔡武甫及张淑雯等眼科医师治疗,保我继续承担研究工作而不废,三十年来所呈著作,俱得三位之赐,此恩至重,永誌不忘。近数月来,又有右大腿骨手术,改装人工关节,今已完全复愈,行路正常,实得温月英、郑新景两位医师的高明诊断与手术。想来我有幸在名医高明护佑之下,而能创造学问业绩,一切成就应是得自他人成全,此恩又岂能忘怀!

自1952年我受教于业师王叔岷先生学“校勘学”。承此启牖,得以进而深研老、庄、列道家诸书,毕生受益。近七年来同在院中时相相接,叔岷师已八三嵩龄,而体气康健如昔,视名利富贵若浮云。我得亲师教亦如四十年前。今草成此书,求王师题字书颜,一则取证师道恩情之永久,二则表我永承师门之薰陶。

拙著承刘广京先生赐序,倍感荣宠。与刘先生为近代史同道,而于我治学鞭策督教最深。我才学不如同辈,而勤勉不懈则不逊于先贤。广京先生怜而教之,其期盼督促我所当研治者,此生只完成十之二三,彼以高才望我,我真愧不能及。今日完成此书,无不感念刘先生时时教导提示之恩。特略申叙,以誌不忘。

此书之研究完成,得有研究助理协助研究工作,深为感谢。门人宋秉仁君始终佐我研究诸务,甚是得力。又有香港门人李光雄君代我在香港搜集资料,亦获助益匪浅,特此一并声叙。

1996年1月27日

写于掸泥挥雨轩

刘广京序

历史上重要的、开辟新园地的著作,其主要论断,每于著作出版后便很容易为人接受;而著作者在达成论断运思求证过程的苦心孤诣,以及学术上的机缘与运会,则读者每未注意及之。王尔敏先生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便是这样一部重要著作。我想此后凡是研究中国近世、近代文化史的人都不能不从这一部书讲起。这部书中提出的中国文化典雅与庸俗的两个范畴,我想学者必定会多讨论,而难于不被说服。

王先生所提出的雅俗之辨,不但对研究中国近世、近代文化史的学者极为重要。对于中国近世、近代社会史的学者也是极其重要。但是社会史不是本书的着重点;王先生并没有自称这方面他已有定论。例如,王先生认为民间世俗文化是庶民主动创造的;这些庶民包括商人。但是有那些商人不是庶民?富到那一个程度的人才会有典雅的文化生活?王先生心目中的平民“知书识字,重在书算,只求识字书写,有益于其职业,故就学甚短。”当时一定有许多商人可以合于这个条件。但是,农民呢?有多少农民也知书识字?已故英国人类学家弗立德曼(Maurice Freedman)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至今常为人引用。他说: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和农民文化不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另一版本,而后者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①这个论断自本书的观点看来过于简单,但是也还需要进

^①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G. William Skinner,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55.

一步澄清。

笔者于1985年10月游大陆四城市后到香港,承王先生夫妇款待,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王宅小住数日。当时王先生已微露他有中国民间世俗文化的兴趣。王先生构思本书时所阅最主要的资料,如明清时代各种版本的《万宝全书》,他在香港时已精读;他在香港新界沙田图书馆也发现了一些对他直接有用的手抄本。其他有关资料他在香港时或于1989年回台湾后都已经研究,而且以已有材料为根据发表论文来讨论。本书的大纲早有眉目。但是王先生的幸运极大。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批大陆各出版社印行的书籍刊布了有关文化与民俗各专题的原始史料及调查研究(见本书征引书目),恰好对王先生最有用;这部书的内容因而益加丰富。这一批大陆出版品在九十年代之初涌现,足证大陆学者及学术机构对文化生活毕竟有极大的兴趣,不完全受主义与教条的限制。王先生这一部纯学术的重要著作可以说对两岸三地(包括香港)的学术交流,深具意义。

王先生要我为本书作序。我读完书稿后只有歆羡——羡慕王先生极其结实又富有想像力的著作,羡慕他文笔的精细流畅,也羡慕他在搜集资料及撰稿时的幸运。

刘广京于加州戴维斯镇

1996年1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二章	民间多神信仰·····	(8)
第三章	日常生活节奏·····	(21)
第四章	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	(37)
第五章	日常礼仪规矩·····	(52)
第六章	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	(76)
第七章	玄理术数之信从·····	(92)
第八章	游乐才艺·····	(117)
第九章	风月调教·····	(147)
第十章	结论·····	(171)
征引书目	·····	(182)
参考书目	·····	(194)

第一章 绪 言

大抵现代学者普遍共喻常识,一致承认文化变迁,是经过长期酝酿,潜移默化。即令有意移植外来文化,亦必须有长期消化时期,方能生根。我人生于现代,又以研究近代现代史为职志,则无论所阅历史实,以至思想观念,器物技艺,并文学艺术,均在欧西文化冲击之下,产生巨大震撼。虽然必不免严重冲突,而总体形势所见,在短短一百馀年间已是物换星移,传统故旧已大量消退沦灭,多数消失生机,往而不复。其于今日之一切生活活动与清末人群事物情景,几乎是两个不同国度,不同世界。人物固不能久长,而一切生活环境,日用器具,起居行为,社会规范,人际交接,俱已充分分出传统与现代之不同。近代人心,鄙夷传统,非笑传统,拒斥传统,割弃传统,以至打倒传统,主要假定传统是进步之障碍,维新之阻力,势必去之而后快。近五十年来,包括本人在内,实已多人注重于研究中国进化、开化、西化、现代化,对于求变求新之大趋势、大动力,均有广泛研究探讨。惟对于所谓传统则不免笼统简化,不求深入研探,一切供为讨论开新之前提,主流之反面,论题之陪衬,不惟态度草率,抑实心有鄙薄,不屑一顾。但以学术慎思明辨立场,我愿专就民间传统文化生活,以观前人大众是如何活着,再看后人之出面解救,能达成至于何项成果。因是而有本书之写作。本人生平论著,本于当代学术潮流风气,对于近代史乘之变局、夷务、洋务、工业化、现代化、科学、民主、变法、立宪、法权、人权、议会、实业、商战、条约、主权,无不作过探讨研究,有论著问世,可以比观。而今不憚回头一探民间传统文化生活,务作客观对比,

折衷至当,至少亦足为学界提供系统约旨,俾其方便采择,信实有征。

前代贤哲力求高深学问,不但渊博深奥,且具古今恒义。余则立志探求俗浅学问。虽是俗浅,亦属严肃论题。惟不求深奥,但重会通;不慕专精,务尽博大;不兢义理之真谛,但见人生之百态。虽然俗浅鄙陋,亦自具学问尊严。如非向壁杜撰,请相信人群之真实。是以凡立一义、陈一词、述一章、论一节,无不据真实史乘史料而判析,为世俗人生所必有,然后方引来据以论断,如非虚构,敬请学者赐予学术之肯定。

前代至少在明清两代而言,儒者为天下士子通称,无稍疑义。但凡知识较深而以儒者自见者,与官绅为同列,而不下侪于平民。就官绅士子之领域言,其一切社会活动,礼仪要求,娱乐类项,交游领域,均与平民有别,自与平民无所相共,一般以儒生身分为其一定标榜。其与平民所分界域,大致简列如下:

其一,就知识根基而言,为最重要之区别基点。平民知书识字,重在书算,只求识字书写有益于其职业,故就学甚短,三五月或一年已足其毕生应用。儒生重在进取功名,基本知识须通五经四书,必须熟用无碍。进而必习作文章诗赋,即必下笔属文,无所疑难。

其二,就志趣选择言,所有知书儒生,首先重在入仕任官,以建功立业为要。设如不能入仕,退而求其生业有着,不至沦为贫窶,则所优为者以绘画书艺为先。其次精研岐黄,以为活人济世之医生。所以以此二者为趣好,在于保优崇节操,存清流之令誉。儒生所不屑为者,庶民则趋向有加,持为衣食之源,则商贾工匠是务。甚至术数俎佺亦无所别择。

其三,识者阅读本书,必启疑相质,既就民间世俗文化作通盘研探,何以设计之中,缺少提论民人服制、居室以及行旅舟车?此

俱日常生活中无时或缺之要项,应于本书有所交代。此固果真重大论域,必须略抒所知于次。

关于服制,明清两代官家规定綦严,官民服制大别,列为功令,入于正史之服舆志,服官品级,亦必严分上下不同之分,决难相通。至民人所受拘限,更一毫不敢逾越。自明太祖御定天下之民须戴“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①,直是奴役天下,比前代更加苛虐。清朝又加上一层满汉之别,而亮红顶,缎马褂,开叉袍,俱属官家特有。然明清两代除小说外甚少详载民人衣着之书,即有亦全集中于妇女服饰。庶民不穿纨绣,农家作业一概赤背光脚,岂会讲求衣着?一般而言,平日芒鞋、布裤、短褐而已。是以未列专章。

明清居民屋宇,小民大多不过茅舍土壁,湫隘卑湿,极尽简苦。农商富家或营华厦、园林。官家限制仍严,平民一组厅堂左右伸展,全不能过五间,官家七间,皇室公侯九间。除祀典庙宇外,陞阶民不能过五,官七阶,皇家九至十一皆可。庙宇亦九至十一阶为最高(孔庙、历代帝王庙俱是)。一般贫苦小民有一栖所,即能满足。富豪之家可以建华厦,示豪阔,惟必须不触犯官家规制。因是多营园林,较不受限制。最须一提论者,所见明清记载房舍厅宇之书,除宫殿庙宇外,实不及涉论营造法式,大多玄谈吉凶祸福之所关,生克运会之所趋。一般市坊民居,只论方位远近,周遭景观,毫不及于建造设计。其能详见构造者,多在于宫殿庙宇,决不及于民户。此处只能指出一般民居之简陋低廉而已。

关于明清两代行旅交通,南舟北车,原具悠久渊源。惟国家功

^① 四方平定巾,在今戏剧表演服饰尚能见到,为民间员外头巾,四方帽体其上平顶。六合一统帽亦常见,小民仆役所戴,乃缝合六块三角形黑布或色绘布,三角顶集于头顶中央,缀以红球,六块三角底部合围布边一条,是谓六合一统帽,今日通称之瓜皮帽是也。